

● 翻译研究

从翻译的重新定位谈翻译符号学^{* 1}

吕红周 单红

(天津外国语大学, 天津 300204; 大同大学, 大同 037009)

提 要: 翻译内涵的丰富和翻译对象的变化要求我们重新审视翻译的定位, 翻译的研究对象出现从语言转换到符号转换的可能。符号化思维和符号化行为逐渐成为人类的重要表征, 以符号共相、代码、符号过程和符号间性等为重要内涵的符号转换成为翻译符号学建构的合法性根基。翻译符号学对翻译本质、规律、模式的独特解释预示着它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空间。

关键词: 翻译符号学; 翻译; 符号转换

中图分类号: H31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6)05-0103-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6.05.027

On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from the Re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Studies

Lv Hong-zhou Shan Hong

(Tianjin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Tianjin 300204, China; Datong University, Datong 037009, China)

The growing connotation and change of objec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require a reorientation, as a result of which sign switch replaces language switch. Symbolized thinking and behavior become an obvious character for human being. Sign switch with com-sign, code, semiosis, intersign, etc., as its content is the foundation of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The unique interpretations of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about translation nature, rules and pattern predicate its broad prospect and development space.

Key words: semiotics of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sign switch

1 翻译及翻译学反思

传统权威读物(如国内的《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和《现代汉语词典》等以及国外的《牛津英语词典》等)对翻译的界定存在较大相似性,大都将翻译视为两种语言的转换行为、过程、结果,是语言活动的一部分,其范畴围绕原文、译文的关系展开。大多数学者对其他学科理论的参照也没有脱离语言转换的性质和特征,对译入行为和译出行为未做区分。如果从“理解即翻译”(Steiner 1975)和“对话即翻译”(Landa 1995)这两个标准出发,那么翻译行为随着人类的出现就已经出现。翻译活动服务于人与人之间、社群与社群之间的信息交流,从而达成某种共识。即便是双方交战时期,我国古代也有“不杀来使”的惯例。这与莫里斯对符号功能的理解有本质的一致性,即符号行为引向的不仅只是合作,也有竞争和共生。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首先要明确它的研究对象。华劭就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和对象物进行区分:多门学科可共同研究某一对象物,但每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华劭 2003: 3)。如“人”既可以是解剖学的对象物,也可以是社会学、心理学和哲学的对象物,但解剖学的对象是人的生理和物理结构,社会学的对象是人的社会属性,心理学以人的心理现象、精神功能和行为为研究对象,哲学研究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翻译符号学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之前也要首先明确研究对象,这样才能避免与其他学科的混淆和定位不清。

国际上对翻译学学科化的构建工作始于 20 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出现各自独立的学派,如结构学派、语文学派、文化学派、食人主义和后殖民等,叙事学、修辞学、意识形态和生态学等理论被用来解释翻译过程。虽然翻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词汇函数理论的俄汉动词语义世界图景对比研究”(13CYY094)和天津市社科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央文献术语俄译的符号学研究”(TJWW15-031)的阶段性成果。

研究的队伍声势浩大、学派林立、理论众多,但“因各学派不是相互批判以求推进,就是各自为营,专门构建自己的理论系统,可大多仍着重言语符号层面,特别是文学领域的文字文本,遗留众多广义翻译范畴内的空白点,如思维与言语符号的双向转换、实体与符号转换等,不但影响翻译概念界定的统一性、翻译理论的构建,更影响区域、民族、世界翻译史的书写和构建”(贾洪伟 2016: 94)。因此,当前国际译学界将翻译的重新定位与定义作为前沿课题,如何能更深入和全面的理解翻译以及翻译理论的建构成为探讨的热点。

我国学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倡建立翻译学。他们对翻译的研究总体上沿袭索绪尔的结构主义二元观,将翻译视为两种自然语言之间的转换,翻译以是否等值为评判标准。翻译理论与实践讨论的内容多围绕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作者与读者、译者与读者、可译性与不可译性、忠实与背叛、形式与内容、语义与修辞和字面意义与隐喻意义等范畴。这种研究将翻译活动定位于语言,具有浓重的语言学色彩,跨学科理论的借鉴仍未达到系统化、学科化的程度,这直接影响翻译学的独立学科地位。

魏向清指出,中国当代的翻译实践已经进入大众翻译时代,“相比传统的精英小众翻译时期,当今大众翻译时代有鲜明的特殊性,即译者队伍规模巨大,水平参差不齐,翻译标准多元,翻译实践量大”(魏向清 2016: 152)。谢天振指出,翻译的定义应随着国家和民族历史的发展而发生相应变化(谢天振 2015: 14-15)。在当前语境下,翻译的主流对象已由传统的纸质文本发展为涵盖文字、图片声音和影像等多种符号组成的超文本和虚拟文本,翻译的手段、工具也吸收科技元素。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传统上以译入为主的活动转向译入和译出并重,民族文化外译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工作重点,翻译“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语码转换过程,而是多种文化之间的角逐”(黄巧亮 2016: 101)。翻译要超越语言的层面(方言到方言、方言到通用语、古代语言到现代语言、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等),把图像到语言、声音到语言、手势到语言、数字代码和人机交互等非语言活动与语言的转换纳入翻译的研究范畴。

2 翻译的重新定位:从语言转换到符号转换

2.1 符号活动:生命的表征

符号活动是所有生命有机体生产和理解符号的本能,这种能力区分生命形式与非生命对象,“符号活动是物种生产和理解以自身方式对认识输入进行处理和符码化所必须的特殊模塑类型的能力”(库尔 2013: 51)。符号活动成为生命的基本特征,西比奥克认为,只有生命实体才会建构生活其中的环境,生命是有机体建构关系的过程、模塑的过程,符号活动停止意味着生命的结束。

“在一定程度上,每个符号(=符号过程)都是模塑。一方面,它通过把有机体的经验包括在内进行模塑,而一个有机体的经验内置于该有机体的个体结构之中;另一方面,符号中对象的存在使模塑和对象彼此一致。与经验的相关性使符号(及其意义)变为多义,而与对象的相关性则使它变为一(单义)。然而,只要它与众多符号相关,那么归根到底来说,任何对象都是多义的。”(同上:52)符号学通过模塑这一工具得以理解符号活动的多样显现,语境的存在使符号学研究对象具有多义性的本质。“就其迄今所表示的看,整个宇宙都进入西比奥克所谓的全球性符号学。于是,人类就是符号宇宙中的一个符号而已。符号学是生命科学和符号科学两相交汇的地方,这意味着,符号和生命彼此交叠,的确,按照西比奥克的说法,符号活动正是生命标准属性。因此,持一种生物符号学的观点,对于充分理解交流行为是必要的。”(佩特里尼 庞奇奥 2013: 173)

符号活动低级阶段体现为物种特征,类似于预先设定的自然选择,其施为者的符号自由有限。符号自由随着人类的出现更加凸显,人类符号活动比动物或植物的符号自由明显得多。翻译活动无疑是人类的主体活动,“语言意义的复杂以及不确定性才使得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主体性被突显出来”(伍小君 2014: 10)。迪利认为,人类和其他生命系统之间的符号差异表现在,人类能区分符号与事物,而动物则不具有这种能力。霍夫梅尔用符号习性互动这一概念阐明生命系统的符号基因倾向,“符号习性互动在一个有机体或物种的规律性行为或习惯被某些其他个体解释成符号的时候发生,还通过释放其他的规律性行为或习惯作出回应。由于符号习性互动的多样特色,这个世界的诸物种于是被编织到了由符号关系所构成的一个细腻的、全球性的网络之中。我以为,很可能,地球生态和生物地理模式不断的稳定发展,靠的正是这些符号关系,而不是其他的什么”(霍夫梅尔 2013: 40)。

2.2 符号共相:符号转换的基础

人是符号的动物,符号不仅是人交流信息和表达自我的外部手段和工具,而且符号在更高意义上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与人的互动、人与社会的互动建构一个个具体的情景,形成符号交流的社会基础。皮尔斯的符号三元观比索绪尔的二元观具有更广泛和合理的解释效力,这为翻译符号学提供启示。符号的外延要大于语言,因为符号可以不是语言,但语言一定是符号。“在经验论和本体论层面上,已经得到确认的是,符号学本质上发生在‘在’(即主体和客体构成的世界)和超越之间。在‘在’之中,所有经典符号学理论,从索绪尔到皮尔斯,再到格雷马斯、洛特曼、艾柯、西比奥克,都行得通。再从主体角度看,超验之物是任何一种不在场但心灵中存在的东西。符号这一概念就是一种超验的东西,因为它是代表不在

场之物的某物。每个交流行为都同时是超验的行为,超出对话中主体A与B之间的虚空。”(科布利 2013: 254 - 255) 社会是主体与客体、个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客体的价值和意义在主体的偏好和选择中得以体现,并非完全由客体单独决定,因此,意义具有相对性。而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互动的基础是意义的共相,那么共相如何达成呢?莫里斯(R. Morris)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个体间性(interpersonality)探讨符号的意义和对象的价值,“当某一个体在交际过程中发觉他的经验与别人的经验相似时,他便超越个人的主观性,达到经验或符号的共相。对米德来说,共相就是一种客观性,是主体之间达成的共识”(张良林 2011: 4)。语言符号的共相是在特定社群中该符号被人们所共享的意指(signification),“根据米德的观点,动物A做出一个行为(如咆哮),动物B将此行动作为符号来作出反应,A自己能把自己的行为当作具有相同所意指的符号来作出反应,这便是符号共相的最初来源”(同上)。

只有当一个机体对自己的行为(或产品)作出的反应与其他机体对该行为(或产品)所作出的反应相似时,一个机体能产生的符号对该机体来讲才能拥有一个与其他解释机体所作出的相同的意指。符号共相可以在不同机体中引起相同或相似的反应倾向,但不必然的会引起相同或相似的行为。米德认为,有声符号(vocal sign)是典型的表意规约符号(significant symbol),有声符号既能被其他机体听到,也能被自己听到,在自己和他人身上能引起相同或相似的反应倾向。“语言符号作为典型的表意规约符号,是一个社团成员所共有的,它对一个人所指谓的内容与对该社团所有成员所指谓的内容相似。当一个个体采取他人态度针对自己,并且自己发出的符号或行为在自己身上引起与在他人身上引起相似反应时,他就向自己表明了该符号的意义。”(张良林 2011: 5) 当共符号能遵循某种组合规则用于表意时,就产生语言符号,即语言符号都是共符号,共符号的主体因为主体间性而对其进行相似的解释,解释者对同一符号具有相似的反应。“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之所以能通过一定的形式系统代替或代表不同于符号自身的其他事物、现象、过程,无非是由于符号的解释者依据一定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规范所作的解释或认知。”(卢德平 2002: 100) 自言自语或思考的过程使用后语言符号,因为这些符号不发声,仅限于个体,但它们是表意规约符号。人类的表意行为通过符号活动来实现,这种人类符号活动无疑涵盖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有机体的内部符号活动(endosemiosis)与外符号活动(exosemiosis)相对,指有机体内的符号传输活动,包括符号自我、基因符号、新陈代谢符号和神经符号等,“有生命的身体内部所传输的信息包括有关身体中的一个系统(细胞、组织、器官或器官系统)的种种操作对其他系统所具有

的意义,对整体起调节作用的设置(尤其是大脑)所具有的意义”(科布利 2013: 253)。

2.3 代码:符号转换的基本原则

“符号是各种人造物或行为,用以指代他物而非自身;代码则是符号组成的体系并使符号之间相互关联。”(费斯克 2008: 1) 情境与文本可互推,即听话人根据特定情境可猜测文本的内容,反过来,从文本可提取其产生的情境,补充文本形式缺乏的相关信息。构成语域的3个概念:语场、语旨和语式并非文本的形式成分,而应理解为文本的决定因素。语域为言语交际提供语言学基础,即文本是特定情境中语义模式的实现。在特定情境中文本的意义受到代码的影响,因此,Halliday称代码是语域的决定成分,根据情境类型进行意义的选择性操作(Halliday 2001: 67)。

个体通过自己的功能语义网络过滤情境文本,从而用自己的意义潜势形成对文本的独特阐释。代码是符号组织的原则,控制说话人对意义的选择和听话人对意义的解释,它控制文化的语义类型。Bernstein指出,“代码通过其语义特征得以界定,而代码的语义特征可通过社会结构的成分得以预测”(Bernstein 1973: 258)。代码不是语言变体,典型的语言变体是语域和方言。方言变体与社会结构,特别是社会等级,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代码位于语言系统之上,是社会符号的类型,是社会系统产生的意义符号秩序。每个人都是一个多风格的说话人,拥有至少一种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在每次社会交际中都会伴随着代码的转换。社会结构控制语言,通过语言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传递。语义系统是语言系统和更高层的符号系统的交互界面,是社会系统的投射或实现,同时语义系统投射到词汇语法系统或被词汇语法系统实现(Halliday 2001: 67)。

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翻译是用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替换另一种语言中的一个词。索绪尔认为,音响形象是能指的心理印迹,与头脑中的概念结合构成符号,他把符号与外在现实之间的联系排斥在符号研究之外。索绪尔把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放在关注的中心位置,因为在他看来,符号的价值在于与系统中其他符号的区别,而并非符号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巴尔特继承索绪尔的符号概念,只是把能指和所指替换为表达和内容,这样表达(E)和内容(C)的联结是关系(R),ERC就是一个符号结构,表达和内容联结的过程就是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与所指结合的过程被称为意指活动,其结果是符号。意指活动并不重视结果,重点在于形成一种区分性意义。叶尔姆斯列夫将这一过程表达为ERC,其中E是表达平面,C是内容平面,R是E与C之间的关系,即意指活动。

费斯克努力将符号与现实建立联系,“我们对公牛的概念与现实中的公牛之间的联系就是意指化,也就是我们为世界赋予意义以理解世界的方式”,这样他把符号扩

展到系统之外,“意指化既有不同语言形态上的差异性,更具有文化上的特定性”(费斯克 2008: 37-38)。意义的动态性就在于它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永远处于符号主体对符号的解释过程。根据皮尔斯对符号的理解,符号是对某人来说在某方面或某种程度上代表某种事物,因此,符号由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构成,符号与对象关联物之间又以相似性、因果性、约定性下分为象似符号、索引符号和象征符号。符号引起接收者的某种情感反应或行为倾向,从而将个人的经验建立起联结,在协商和互动的过程中产生个人的符号释义。象似符号与对象关联物之间的相似性程度或理据性最高,索引符号次之,象征符号则具有最大的任意性。费斯克用“惯例”(convention)来表达这种程度。“惯例是符号的社会维度,它是使用者之间对符号恰当使用和反应的一种协定。如果没有社会惯例维度,那么符号就仅仅是私人的,不能用于传播”(同上:48)。

3 翻译符号学

3.1 翻译符号学的源起

翻译符号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是翻译学与符号学发展的内在需求。虽然翻译行为的主体内容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但随时代的发展,虚拟文本和超文本的出现、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符号多模态的广泛运用使传统上以语言为定位的翻译理念陷入困境。单独依据某一学科理论(如信息论、传播学、语言学和修辞学等)建构翻译理论显现出局限,因此翻译的重新定位和定义成为学者关注的问题。雅各布森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翻译的三分,即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这是翻译研究中最先出现的符号学术语。但雅各布森的三分将语言与符号并列,并未对两者之间的区分和各自的内涵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关于这一点,有一部分国内外学者将目光投向符号学,如格雷(D. Gorlée)早在1990年就提出翻译符号学的概念,爱沙尼亚塔图大学的特鲁普(P. Torop)就翻译与符号学发表系列重要文章,论述翻译符号学的前景、研究对象、学科定位和理论构建等前沿问题。“翻译的重要性在符号活动和总体上的符号操作之中,翻译被理解为一种操作,一个符号实体被认为与它所取代的另外一个符号实体是等同的,它预先认定:翻译行为(translating),一个符号实体被另一个符号实体所取代的一系列操作;可译性(translatibility) 符号实体之中的可彼此替代性或交换性。”(科布利 2013: 435) 国内自1988年起先后有学者从符号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借用符号学理论分析和验证文学翻译、翻译等值和身势语翻译等。直到2015年才出现翻译符号学这一概念,如贾洪伟(2016)“翻译符号学的概念”。

翻译符号学的提出是对以往符号学诠释翻译个别问

题的反思,即没有从学科融合的角度审视翻译行为作为研究对象,也尚未上升至构建系统的、理论化的、学科化的理论体系阶段。王铭玉和贾洪伟一致认为,翻译符号学是符号学的分支学科,以符号学理论为依据,把翻译行为视为符号过程和符号行为,探讨这一过程中的符号转换现象及其相关问题(王铭玉 2015: 21,贾洪伟 2016: 96)。就从符号学视角切入翻译研究,给翻译重新定位的意义,贾洪伟认为,“翻译符号学打破了以往只侧重有形符号之间的转换,将研究范围扩展至有形与无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及其相关问题,不但丰富了符号学的疆域,也符合新时代符号转换的多层次、多媒介跨域合成的新需求”(贾洪伟 2016: 97)。对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探索一方面符合国际译学界重新定位翻译的研究趋势,另一方面也是符号学与翻译学本土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3.2 翻译符号学的研究对象: 符号转换

语言无疑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思想和表达意愿的方式,对语言转换的分析是翻译研究的核心内容,但语言并非能涵盖人类的一切交际行为。一方面人类把语言作为对象,另一方面又把语言作为解释语言的工具,这样势必出现元语言与对象语言之间难以区分的矛盾和混乱。Torop指出,从心理和意识形态去思考翻译的重要性。“一方面把翻译过程视为语际、语内、符际翻译综合体,另一方面翻译是语言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行为。译者工作在语言、文化和社会的边界”(Torop 2008: 375)。

索绪尔对语言能指和所指的二元划分曾经给语言学的现代化带来巨大推动力,之后发展成为形式与内容的绝对二分和社会与个人的直接对立。现实情况表明,社会与个人不是简单的对立,社会也不是直接由个人组成,“人拥有以社会场景为指向的符号选择权,以及在符号使用方式上的自由”(卢德平 2002: 11)。人使用符号的自由是社会与个体之间中间环节存在的证据,戈夫曼将这个空间称为社会情景,社会是由个体、社会互动、社会构成的三元结构。社会的成分也不再是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而是个体的动态互动形成多种多样的社会情景,“承认个体在语言符号运用过程中这一受规则支配的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意味着对人的符号体系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确认,同时也是有效实现社会规则的基础条件”(同上)。

3.3 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架构

翻译符号学以翻译过程中发生的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关于这一点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达成一致认识。在明确研究对象之后,就翻译符号学的基本概念还需要进行深入梳理,如学科术语、学科定位(翻译符号学与翻译学、符号学的关系)、学科内涵、学科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学科队伍建设和学科刊物建设等。

就学科归属而言,翻译符号学是符号学的分支学科,是翻译学和符号学的融合性研究,它的学科术语将会与

这两门学科的术语产生交叉,但会有意义上的差异。如翻译过程中的符号主体是翻译学中作者、译者、读者,符号转换替代语言转换,而符号转换的范围和内容都已经超出语言转换,符号转换根据不同的划分原则分为语言符号转换(如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方言到方言、方言到通用语、古代语言到现代语言等)和非语言符号转换(如表情、动作、声音和图像等)、有形符号(指有可观察的载体,如文字、旗语、密码、乐谱和绘画等)与无形符号(如思维、想法、价值、信仰、习俗和倾向等)。就学科的方法论和认识论而言,在确立符号这一本体论地位之后,要深入发掘语言哲学、阐释学和逻辑学等与翻译符号学认识论的内在联系,围绕符号转换这一核心范畴建构科学的、操作性强的、具有广泛解释力的认识论基础,做到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有机统一。

就翻译符号学初创阶段的核心内涵,王铭玉(2015)认为,翻译符号学的学科内涵非常丰富,至少涉及符号过程、符号行为、符号关系、符号层级、符号间性、符号功能和符号守恒等层面。客观地讲,翻译符号学是我国翻译学研究具有前景的研究方向之一,前期国内外学者从符号学角度研究翻译问题的成果都是一种铺垫性的工作。明确研究对象和学科定位,区分翻译符号学、翻译学、符号学和符号学翻译等一系列重大概念,厘定核心术语的内涵,建构合理与科学的研究框架,都是翻译符号学初创期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目前和将来一段时间里我们工作的重点。

4 结束语

人类文化是彼此交织的符号系统组成的网络,文化对生存其中的个体具有强制性,个体理解和认知周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文化中业已形成的各种符号系统。人是符号的动物,不仅有符号活动能力,而且有符号学能力——用符号来对符号进行反思,因而能够具有充分的意识,能够在充分的意识中采取行动。人这种具有意识的符号动物,能够用全球性眼光来看待生命和交流。翻译从语言转换到符号转换深度契合人类生活其中的符号世界,亦与翻译学追求统一理论的愿望一致。翻译符号学是当下历史语境的产物,它对翻译的重新定义、对翻译的理论化和系统化解释必将推动我国翻译研究的本土化进程,为丰富世界翻译学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 费斯克. 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华 劭. 语言经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黄巧亮. 文化态势与翻译策略选择[J]. 外语学刊,2016(1).
- 霍夫梅尔. 自然符号学[A]. 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贾洪伟. 翻译符号学的概念[J]. 外语教学,2016(1).
- 科布利. 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库 尔. 环境界与模塑[A]. 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卢德平. 皮尔士符号学说再评价[J]. 北方论丛,2002(4).
- 佩特里尼 庞奇奥. 符号伦理学[A]. 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
- 王铭玉. 翻译符号学刍议[J]. 中国外语,2015(5).
- 魏向清. 论大众翻译时代译者的术语意识与素养——从莫言诺贝尔文学奖评语中的术语翻译谈起[J]. 外语学刊,2016(1).
- 伍小君. 元话语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研究[J]. 外语学刊,2014(6).
- 谢向振. 现行翻译定义已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对重新定位和定义翻译的几点反思[J]. 中国翻译,2015(3).
- 张良林. 米德对莫里斯符号学的影响[J].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 Bernstein, B. *Class, Codes and Control: Applied Studies towards a Sociology of Language* [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 Halliday, M. A. 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Landa, G. Notes on the Epistemology of Translation Theory [J]. *Journal des Traducteurs*, 1995(3).
- Steiner, G.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Torop, P. Translation and Semiotics [J]. *Sign Systems Studies*, 2008(2).

定稿日期:2016-06-05

【责任编辑 王松鹤】